

钟楼街史话之

涉事先贤不可轻

王继祖 王琛

5 傅霖

入明以来,太原府城扩建,由区区十里之城,发展为崇墙雉堞、壮丽甲天下之“锦绣太原城”。城中最为宏伟之建筑乃为环城12座大楼、93座小楼,还有钟楼、鼓楼两座楼。太原的千年古街“钟楼街”,就是因为明建大钟楼于东门正街西端寿宁坊之西,遂将东门正街改名曰钟楼街。

过往,大多数太原人都以为泰山庙对面的那座拆除于民国年间的钟楼,就是明初创建的大钟楼,其实错了,明朝初年所创建的大钟楼,在明万历九年之后就拆掉了。位于泰山庙对面的那座钟楼,其规制和体量都远不及明初谢成建的那座大钟楼,是明初大钟楼拆掉之后,选址另建于泰山庙之南的,与泰山庙隔钟楼街而分坐南北。

钟楼的这些演变和史实,如果没有傅霖的《重建钟楼说》(后简称为《说》),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傅霖的此《说》文隐隐约约地告诉后人,万历之初,山西天灾不断,长年不息,太原尤甚。不知为什么,天灾之祸,又连上了“察院之火”,察院之火,又引出察院、钟楼先后迁址和拆迁移址重建。其他不说,这条原来名东门正街的宋以来古街,明初改名钟楼街,真正存在着难解的“宿命”。为什么这样说:明太原城周24里,36平方公里(9平方公里),初始将大钟楼选址建于寿宁寺之西,而在明初大钟楼建之前,早有寿宁寺之钟楼为市民服务多年,它就与明初大钟楼分坐帽儿巷东西,近在咫尺间,也可以说同在钟楼街上。与鼓楼同时创建的大钟楼,为什么要拆除移址重建?从不少史料看,似与察院火灾有关,所以与察院先后搬迁,先后重建。既要拆掉选址重建,偌大太原城,为什么不选建于他处?却还选址于与大钟楼相距仅仅百米的同一条街上?难道果如民间戏言,“是吃饱了撑的”?

好好读傅霖的《说》吧,文中曲折离奇,似明似暗,似隐似喻,能说清又不好说清,也不愿说清的地方太多了。这就是傅霖的《说》文与钟楼迁址重建剪不断理还乱的扑朔迷离之处。

傅霖是何许人也?是傅山的爷爷,是太原双塔寺中双塔之一的文峰塔创建的首举事者,是万历皇帝下诏派员来太原请其重新回朝做官而敢拒旨逆命的耿介忠良之臣,是太原钟楼街钟楼迁址重建的民间士绅举事者。我们正因此事,而选其人文,以志不忘。

6 朱彝尊

钟楼街之所以敢称“一条街一千年”,就是因为有与太原宋城同时创建的“寿宁坊”以及“寿宁寺”,而寿宁寺经历了宋、金、元、明、清、民国,没有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客观地讲是因为其初创时便得到了宋太宗的垂青,赠之以皇家御书;宋真宗的呵护,书文镌碑,刻石留名。于是,才有金代之重建重修,才有元代、明代的传承。尤其是到了清代,又得到了著名文学家大家朱彝尊的关注和重视,并将已快淹没于历史的宋太宗赠书寿宁寺、宋真宗镌碑寿宁寺之古事、故事、趣事钩沉出海,树碑作跋,引起世人的重视。他亲撰并镌之于碑的《宋太宗寿宁寺书库碑跋》虽仅二百七十八言,但却为寿宁寺再传承于有清一代,不至于寺毁僧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惜宋建金修明传清再修葺一新的寿宁寺,毁于清末辛亥革命太原义举时兵痞的抢劫烧掠。如没有朱彝尊之“碑跋”,遗文留存于县志,我们对寿宁寺宋初之大举,两代皇帝赐书、铭记之事,将无法洞察,钟楼街千年街史亦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兹将朱彝尊《宋太宗寿宁寺书库碑跋》点校并全录于下,铭志之。

宋太宗寿宁寺书库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书库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书勒石在太原府寿宁教寺。碑为风雨崩剥,其半没土中,岁久尽蚀。文凡两千余言,仅存数百字。其阴石尤泐,所可识者,有太宗御制文集四十卷,又集十一卷,怡怀诗一卷,回文诗一卷,消遥咏一卷,至理勤怀篇一卷,宋志载御制集一百二十卷。盖统言之也。按史帝既削平诸国,收其图,下诏购遗书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徙三馆书实之。此崇文书目所自始也。又三分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所谓秘阁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实之馆阁,使修群书,以役其心。则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权谋秘计,而非性所好也。虽然亡国之臣,世主往往轻视之如土芥,而重绳刀锯。帝独容之,禁侍之,列给笔札事纂述,谓非世主所能欤!嗚呼!是可惜也。

朱彝尊其人,字锡鬯,号竹垞,清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中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参加《明史》的纂修,体例多从其议。其博极群书,长于考证,工古文,通经史,为浙西词派之创始人。在山西为官时,足迹遍州府,最喜太原,遗有丰富诗文。



连载

“考古与上古史探索就是这样经历着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的过程。”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也是个意外。本来,徐旭生是找清乾嘉时期目录学家、经学家孙星衍(1753—1818,江苏阳湖人)和偃师知县汤毓倬合纂的《偃师县志》所载黄帝之曾孙帝喾高辛的故地,因为“县志对于地点指的很清楚,所以想此次顺路调查它是否确实”。没想到却把二里头误认为“商汤都城”;更没想到二里头在日后成为“夏墟”调查的最耀眼夺目的一颗明星。

5月16日,他们的调查从高庄开始。早饭后,徐旭生和方西生先到偃师县文教局,文教局一位同志带着他们同到县文化馆,见一专管文物的姓高的同志,看过馆藏的偃师县出土的文物,由这位“高专员”

陪同,到离县城南三里远的高庄寻找上古遗址。但在这里,除了方西生在村中的一个坑内挖出一个鼎足外,没有看到想找的遗址。又“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饮水(午饭在新寨吃),后到村南里许”。二里头当时是翟镇镇人民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因与洛河北一亩古城池相距两里,故名。其南有高耸的嵩山,其北面是绵亘的邙山。徐旭生所看到的二里头,此时已是一个由县里保护起来的遗址。1957年冬,“由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高同志由闻挖塘时发现古陶片,往视察,遂发现此遗址。塘挖未成,由县下令禁止续挖,保护遗址。”从徐旭生当



46

苏 华 著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天的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到,二里头遗址并不是他所发现,而是由带领他们前来此地的偃师县文化馆专管文物的“高专员”首先发现并报告县里有关部门加以保护。“高专员”大概曾作过老师,他们来时,还把他的一个叫赵法

在的学生叫来。赵同学拿来一石斧、一骨针、一汉代尖底罐,大致的情形是汉罐交“高专员”,由县文化馆保藏,石斧和骨针送给徐旭生,供考古所研究。“村人言,此遗址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此时已将下午五点,“兼闻雷声,北方云起,遂急归”。从徐旭生的这则日记可以看出,那一代学人大多皆有公私分明、你我分清的优良品德,无论是学术还是生活。徐旭生并没有贪二里头发现的首功,他所做的只是在“高专员”发现的基础上,予以考察并加以确定而已。给徐旭生戴上“发现”的光环,不是因为看到了他的日记,就是为了锦上添花。与徐旭生同在现场的方西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就说:“遗址是

在1957年冬季发现的,1959年夏天,徐旭生先生等做过调查,并指出这里有可能是商汤的都城西亳。”之后便不再说“遗址是1957年冬季发现的”了,而是统一口径,只说是徐旭生发现并指出……云云。

夏鼐也是“1957年发现说”的一位重要知情人。1983年,他应邀在日本广播协会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其中讲到“偃师二里头文化”时说:“这是1957年发现的。1959年夏天我们考古研究所徐旭生老先生,做河南省西部‘夏代废墟’的调查时,到这里进行考察,指出这里可能是商汤的都城西亳。”由于《文物》杂志在1983年第3期刊登了河南登封县王城岗遗址调查报告,引起日本广播电视和报刊界的极大兴趣。